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三十一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晋商万里茶路

程光
李绳庆
著

晋商万里茶路是清代山西商人开辟的一条绵延 200 多年的漫漫商道。“茶叶之路”的开辟，是晋商进行国际贸易的大手笔，是突破统治者禁锢的卓有成效的市场运作，是儒商义利谐调的商业文化的真实展示。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郭红娟

复 审：张静华

终 审：严果生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31辑)

晋商万里茶路

程 光 李绳庆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625 字数:300千字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978-7-900454-34-8
G·142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璧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茶路的缘起	(2)
二、茶路的行程	(6)
三、国际商城——恰克图	(42)
四、茶路的富商	(48)
五、茶路的衰落	(52)

引子

美国学者艾梅霞(Martha Avery)所著《茶叶之路》(中信出版社·2007)一书中写道:“‘茶叶之路’是一条联结中国东部和俄国西部的商路”。作者认定,茶叶之路从中国的福建开始,至俄国的圣彼得堡结束。无疑,这应该是“茶叶之路”的完整概念。这条随茶叶贸易而开通,始于中国南方,经蒙古至俄国圣彼得堡的商路,曾经在东西方贸易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引发了亚欧大陆腹地全面、深刻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茶叶之路”,始自公元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相对固定的路线和大规模的运销活动正式形成于1727年的《中俄恰克图条约》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华民国初年结束,历时两个多世纪。

从最近距离测算,“茶叶之路”全长应达9 000千米,其中俄国境内5 000余千米,中国境内主干线近4 000千米(含当时的外蒙古境内960千米,下同)。俄国境内的茶路,东起恰克图,横跨西伯利亚荒原、乌拉尔山脉,经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主要由俄国和蒙古商人运输(后期中国商人曾进入俄国境内运输,直至莫斯科);中国境内的茶路,南起福建武夷山(后期由湖北羊楼洞起),纵穿长江、黄河、长城、草原和浩瀚戈壁,直抵当时中俄边界的恰克图,完全由华商运输。运茶的华商绝大部分是山西商人,所以堪称“晋商万里茶路”。

山西位于中国北部,境内并不产茶。但“茶叶之路”是清代山西商人开辟的一条绵延 200 多年的漫漫商道。它是继汉唐丝路以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壮举,与丝绸之路同样彪炳史册、光垂千古。丝绸之路跨越亚欧大陆,传播了中华文化,牵系了亚欧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茶叶之路纵贯戈壁大漠,输送了华夏特产,弘扬了神州赤子和谐友善、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茶叶之路”的开辟,是封建王朝时代难能可贵的民间大规模远途商贸活动,是晋商进行国际贸易的大手笔,是突破统治者禁锢的卓有成效的市场运作,是儒商义利谐调的商业文化的真实展示。特别值得记取的是,19 世纪中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鸦片向中国疯狂贩运、滚滚南来之际,正是晋商运载茶叶艰难跋涉、源源北上之时。

清代至民国初年两个多世纪运往俄国的茶叶累计达 25 万吨以上,经济总价值至少合 100 万两黄金,这在中国茶叶史、东亚运输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上都无疑是流光溢彩的千秋伟业。

一、茶路的缘起

茶叶原产于我国。约在公元 500 年前后,福建山区农民开始培植茶树。盛唐时期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的诗歌中鲜见“茶”字,中唐之后,随着“茶圣”陆羽(733—804)《茶经》一书的问世,饮茶风盛南北。白居易

(772—846)的长诗《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茶叶已成为规模化的商品。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辽两国达成“澶渊之盟”，朝廷以茶叶向辽国“进贡”。许多学者认为，辽国“契丹”民族的读音(Kitan/Kitai)最终成为俄国人对中国的称呼。60年后，宋朝设立“茶马司”，与青藏高原的吐蕃进行以茶易马的贸易。明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蒙古族土默特·俺答汗率骑兵大举入侵，威胁明朝政府开放边境贸易，但嘉靖皇帝对“马市”严加限制。隆庆五年(1571)，张家口、大同等处开始形成中国北方的“茶马互市”。万历五年(1577)，明廷正式给予蒙古人介入茶叶贸易的官方认可。正值此际，俄国沙皇伊凡雷帝(1533—1584)征服了伏尔加河流域，“俄国人”开始穿越西伯利亚，向东亚发展。

16世纪，阿拉伯人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国的茶叶传到中亚和东欧，不久，葡萄牙海员从中国带回茶叶。欧洲人最初把茶叶视为“治病的灵草”，由于价格高昂，只有很少人能够享用。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从澳门收购福建武夷山产的茶叶，接着，英国东印度公司也用白银从中国换回400吨茶叶在伦敦市场销售，茶叶很快成为贵族阶层高雅的礼仪饮品。17世纪中叶，英国上流社会开始风行“午后茶”，18世纪初期，大众化的茶馆在伦敦蓬勃兴起，曾多达2000余个。饮茶风靡西欧各国时，北美洲茶叶的销量也很大。18世纪中叶，茶税成为英国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因为在波士顿强行征收茶税，竟引发了北美殖民地1775年开始的独立运动。

中俄茶叶的正式贸易,始于17世纪90年代。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爱新觉罗·玄烨大帝(1654—1722)的钦差大臣索额图与彼得大帝(1672—1725)的代表戈洛文在现属俄国的涅尔琴斯克(位于内蒙满洲里北300千米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两国确定了各自的疆域范围,条约第五条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自此,开始了边境贸易。俄国政府积极鼓励商队通过蒙古地区深入到张家口、北京采购所需的各种商品,茶叶随着其它商品开始在北方市场或通过蒙古地区进入俄国。康熙三十二年(1693),彼得大帝派伊台斯为使节,率数百人的商队来到北京,次年与清廷理藩院会谈,达成新的协议:准许俄国商队来北京贸易,人数不得超过200人,隔3年来一次,定限80天后起程回国。伊台斯商队满载而归,一年后才返抵莫斯科。康熙三十六年(1697)玄烨亲征噶尔丹获胜后,全面开放了汉蒙民族的民间交易,俄国商人通过外蒙古(今蒙古国)大量购买中国的茶叶。

康熙六十一年(1722),玄烨病逝;3年后,彼得大帝也去世。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36年间,俄国官方先后派出11支商队到北京,最初获益甚丰。18世纪早期,俄国人买进的产品包括茶叶、牛、皮革、丝绸和瓷器,还有大黄。

雍正四年(1726)9月,爱新觉罗·胤禛皇帝的代表、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4人前往边界与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的代表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金斯基伯爵在两国边境的布尔河边会谈。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1727年8月31

日),清廷代表额附策凌(赛音诺颜部的蒙古亲王、成吉思汗的二十一世孙、康熙皇帝的女婿)与萨瓦伯爵在恰克图草签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经雍正皇帝批准后,次年6月25日,两国使臣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两国勘定国界,并确立了“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者,可在尼布楚和色楞格之恰克图选择适当地点建盖房屋”作为边境贸易市场,双方商人不准越境,但可以在边贸市场自由贸易。由于恰克图比尼布楚距离近的多,所以很快就形成了繁荣的商城。

明清之际,西伯利亚一带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饮茶之风日炽,达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到了19世纪,随着俄国工业化的发展,茶俗普及到社会的每个阶层,许多家庭每天都离不开茶。由于俄国人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茶的销路特别好。每当运茶的驼队到达贝加尔湖后,俄国人就团团围住茶商,争着用皮毛、牲畜换取茶叶,有时甚至跳起舞,迎接驼队的到来。

恰克图市场贸易的近200年间,茶叶是欧洲人的三大饮料(另两个是咖啡和可可)之一。19世纪中叶,英国用于购买茶叶的白银缺乏,东印度公司为此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满清政府在战败后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五个沿海城市,其中广州、福州和厦门都是主要茶市。

欧洲市场的茶叶,主要依靠轮船从中国的广州、福州等地穿越中国南海,出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绕道南非好望角,从大西洋北上至伦敦,海运总距离约达25 000千米,运

距漫长(相当于从中国福建到俄国圣彼得堡的两倍半),运输成本昂贵。

二、茶路的行程

(一)万里茶路的始足点——武夷山下梅村

武夷山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闽江上游地带,平均海拔600余米,丹山碧水,气候温润,盛产“岩茶”。

武夷山的茶叶最早走出国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东南20千米的下梅村是最早的茶市,也是公认的“万里茶路”的始足点。民国《崇安县志》记:“康熙十九年(1680),山西茶帮经江西铅山,过分水关,来到下梅和赤石,设栈收购,建厂制茶”。每年清明前,被称为“西客”的晋商来到崇安,县府官吏和当地岩主视之为“财神”,鸣炮郊迎,礼遇有加,争相招呼,其豪奢崇敬情景,至今口传不绝。袁翰《茶市杂咏》记:“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茶事毕,始结算别去。”康熙年间(1662—1722),晋商从武夷山贩运茶叶尚未直达中俄边境,而是销往山海关外,然后转销尼布楚,也经雁门关外的大同、张家口等地销往蒙古地区,并在北京、张家口、内蒙和外蒙地区销售给前来采购的俄国商人。

清代的下梅村,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工匠众多,人口稠

密。贯穿全村的“当溪”，是一条长近千米的人工小运河，水深曾达数尺，当时有9个埠位，竹筏蓬船出入自如，“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在下梅加工后的茶叶，从当溪出来，进入梅溪，西驶抵达赤石村。当溪两岸的遮荫棚前，至今存留着上百年的杉木栏杆，已被臂肘磨的油亮变形，这是茶商和船工运茶离埠时，他们的妻子或情人倚栏送别之处，此地一别累月经年，有的竟自此生死茫茫，音信杳然。他们的妻子或情人每日倚栏眺望，这些栏杆，那时就被人们称为“美人靠”。

（下梅村清代民居建筑至今尚存，已被国家确认为“历史文化名村”）

恰克图市场繁华的道光年间（1821—1850），处于武夷茶山中心产区的星村镇成为重要茶市，一度被称为“小苏州”，茶行曾有72家，船筏数百艘，船工400余人。由星村沿“九曲溪”东驶10千米，抵赤石镇。

赤石镇距崇安县城15千米，“红茶、青茶由山西客商到县来办，运往关外销售。”清末，赤石镇街面上有各种货栈商行，通宵达旦营业，热闹非凡，曾被人们称为“小上海”，镇上至今尚有石板街和古商铺遗迹。

由赤石镇抵达崇安县，县城附近有全长近百米的“余庆桥”，卵石铺底，青瓦覆顶，这是晋商万里茶路上的第一座能够避雨的廊桥。大量茶叶自崇安县城上岸，由脚夫担挑或用“鸡公车”推过闽、赣交界的分水关，进入江西。

康、雍、乾三朝（1662—1795），晋商中的“大盛魁”、太谷曹家、祁县渠家和乔家、榆次常家等率先南下武夷山，不

惜耗费巨资,自置茶山,雇用江西民工采茶,设厂自栽自制。“大盛魁”的“三玉川”茶庄在武夷山有茶山5 000亩,茶厂7座,其他晋商在武夷山至少还有茶山30多座,有的委托当地人代为经营。茶叶经过精制加工和包装后,雇脚夫用独轮车和竹篓从崎岖山路运至江西铅山县境。从清初到民国年间,闽北的崇山峻岭中,飞泉山溪,流水湍急,漫漫石路,曲曲弯弯。茶商们为了运输方便,在山径乡路上铺上了石板,筑起了石桥。百里古道,曾经是摩肩接踵、人流如潮。至今,在分水关附近,仍能间断地看到当年修筑的石路和桥梁,那些被脚板磨得光亮的石板和被“鸡公车”碾压的深凹车辙,也还历历在目。昔日的武夷山,峰回路转,林莽茂密,常有野兽和毒蛇出没,再加气候炎热,远路的客商一旦生病或被蛇咬,往往毙命途中,尸骨难以还家。古茶路旁,现在还留存着光绪六年(1880)的“孤魂”碑石和“孤魂总祭”碑,这是当地士绅将丧命于路途上的外地客商尸骨集中掩埋的“行善积德”之举。

晋商远行数千里外的异乡,不服水土病故者或中途罹难者绝非少数,其中有多少走上不归之路,自然难以计数。从《常氏家乘》等家谱资料中能看到,晋商家族中许多人“外出”,有的“卒于外”,未归葬于族茔,其中有许多人成为万里茶路上的“孤魂”。

晋商前来采购茶叶的掌柜和伙计跟随茶队从崇安县下梅村出发北上,到分水关(山上有一条泉溪,向南流入福建,向北流入江西),约60千米,再到江西铅山县(今永平镇),约50千米。永平镇现存完好的“大义桥”,全长近200

米,风雨千年,是万里茶路上的第二座石拱长桥。在永平码头,茶包装入小船,入铅山河顺流向北,经 20 千米水路,即到信江岸边的河口镇。

从福建崇安县下梅村到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共 130 千米,水陆行程大体各半,若无天气影响,昼夜兼程,两日抵达。

(二) 河口——信江——鄱阳湖——九江

明宣德年间(1426—1435),河口镇(今铅山县治所在)已是茶市。至万历年间(1573—1619),河口红茶驰名,誉为“河红”,是海内最早的名牌茶叶。清代自恰克图开市后武夷山茶叶大量北运,晋商纷纷来到河口采购、加工茶叶,铅山县的茶叶贸易进入鼎盛时期,使河口镇成为拥有 3 万多人口、茶行林立的著名茶市。《铅山乡土志》记载:“‘河红’繁盛之时,商家买办,每年不下百万金”。春夏之交,镇上有成千的拣茶女工,时有《竹枝词》云:“狮江妇女趁新茶,鬓影衣香笑语哗。齐向客庄分小票,春葱纤剔冻雷芽”。至道光年间,河口有茶行 48 家,以“西客”最多,每家资本数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返,络绎不绝。清代后期,山西票号还在河口镇设立 20 多家分号,以利货款汇兑。

沿信江南岸的河口古街,全长近 3 千米,“九弄十三街”,街巷用长条青石或麻石铺成,路面磨得十分光亮,百年车辙历历可见。街道两旁尚存清代和民国店铺数百家,宅院大多临河而建,以便茶叶装船发运。河口镇旧时曾有 4 个码头,能出入 10 吨以下的帆船,码头装卸和船筏出入都异常繁忙。

载茶的帆船在河口镇进入常年通航的信江水路,顺流出黄沙港,西经弋阳、贵溪,至鹰潭折向西北,过黄金埠,从余干县瑞洪镇驶入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北驶 120 千米,出湖口,进入长江。

自河口镇至湖口,共 300 千米顺流水程,行程 5 日。

由湖口石钟山下西折,茶船先到“襟江带湖”的九江港。九江,将赣、闽、皖三省的茶区连接到一起,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与汉口、福州并称为海内三大茶市。茶商在这里又收购质量上乘的安徽和江西产的红茶、绿茶、砖茶和茶末,并办理“茶引”(经销许可证),接受批验,缴纳茶税。

光绪八年(1882),九江的茶商增至 344 家。

从九江开始,每船由数十名苦力纤引,溯江而上。不论是酷热涨水的夏季,还是三九封冻的严冬,纤夫们搏激流、踏冰雪,肩背纤绳弯腰爬行,“拉纤江边走,血泪跟着流”。从九江经武穴,过西塞山下,经黄冈的东坡赤壁,“乱石穿云,惊涛拍岸”,至汉口码头,茶船向西北逆行 180 千米,行程 6 日。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南京,长江中下游成为饱经兵燹的战场,闽赣茶路被迫中断,晋商纷纷转至两湖经营。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率湘军收复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武夷茶路恢复,但晋商茶路的主线已转向两湖茶区。

(三)安化——资江——洞庭湖——岳阳

位于湖南中部资江中游的安化县,境内峰峦叠嶂,温暖湿润,自唐代就产茶。明代,“安化黑茶”曾被列为贡品,万

历年间远销西北。由于武夷山路途遥远,山西茶商也早已着眼于此。据湖南史料记载,山西曲沃茶商乾隆年间(1736—1795)就曾到安化买茶,陕商于道光元年(1821)在安化订购“百两茶”;又据祁县“大德诚”(乔家堡乔家商号)文献记载,嘉庆末年“来安办黑茶”。县境西北隅马路镇湖南坡村,地处深山,村中有座木楼的壁板上曾有过道光年间(1821—1850)晋商题写的一首藏头诗:

湖通四海遍地游,南山松柏立千秋;

坡上奇茗仙香味,茶得丰收万古留。

(此楼于数年前拆除,诗句系老村长邓宗元先生口述)。村人至今记得祖辈说过,每年三月晋商来这里租赁木楼收购茶叶。雷南等的《湖南安化茶叶调查》一文称:“安化原为黑茶市场,至清咸丰初年,始有红茶之制造。当时年产红茶约十万箱……红茶销于俄国者约占70%,英美仅占30%。”近年发现的晋商《行商遗要》记:“安化江南、黄沙坪、东坪等处‘茶甚佳’。”据安化洞市“利德隆”茶厂资料记载,著名的“千两花卷”茶,是同治年间(1862—1874)晋商乔家“三合公”号为运输方便,聘请边江村刘姓技师试制成功的,“千两茶”是用棕叶和竹篾捆压包装的每捆千两(合今31.25千克)的园柱形紧压卷茶,曾享誉蒙俄茶路和西北茶马古道。

咸丰(1851—1861)以前,恰克图主要销售福建红茶,由于战争影响,茶源阻断,据同治《安化县志》记,茶商将安化黑茶打包封箱,掺入武夷红茶或冒称武夷红茶出售,结果这种茶更适合俄商的口味。后因安化茶清香味厚,不亚于

武夷茶,于是公开以“安化”字号进入国际市场,以致有“无安化字号不买”的声誉。清末,安化红茶在俄国颇受欢迎,从汉口出口量很大,最盛时期的光绪六年至十二年(1880—1886)由恰克图出口6万余箱。

安化县洞市村附近至今仍能見到百年前石板铺砌茶马古道,江南、唐家观等村镇现在还有一些清代晋商加工茶叶的作坊和存放毛茶的木楼。

资江,是安化茶叶水运的主航道,江上的船舶全是木帆船。清末,安化县境内主要有7处港口,全县脚夫多达千余人。安化西部山区的茶叶进入资江后,运茶的船筏向东行驶,经东坪镇、黄沙坪,至江南镇与自洞市运来的茶叶集中。据《行商遗要》记载,东经马家滩(今马迹塘镇)、休山(今修山镇),驶至桃花庵(今桃江县治)。虽为顺流,但多有浅滩险阻,再向东北经兴家河(今新桥河镇)、益阳县(今资阳区)和沙头镇,至湘阴县麟趾口(今临资镇)入湘江,向北顺流至李石山(今汨罗市磊石乡),而后进入岳阳县境之鹿角,穿越八百里洞庭湖,北至岳州府(今岳阳市),从岳阳楼下向东北行驶,自城陵矶进入浩浩荡荡的长江,而后顺流向汉口驶去。

自安化的边江村码头至城陵矶,共约320千米;自城陵矶至汉口,约220千米。风雨无阻,安化至汉口水路行程共需6日。

(四) 临湘——羊楼洞——赤壁

从明代起,晋商在两湖就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明末,湖北云梦县“城内多山西商贾”。清康熙三年(1664),晋商

在长沙坡子街建立了会馆，十年后，修建了湘潭码头，至清代中叶。徐继畲说：山西富户“其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

两湖交界地带的湖北赤壁市（原咸宁市境，中心为蒲圻区）和湖南的临湘市境，地处幕阜低山丘陵与江汉平原的接触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岗峦起伏，“六山两水两分田”，红壤为主，适宜产茶。明《蒲圻县志》载：宋景德年间（1004—1007），蒲圻大批茶叶销往西域各族，从事茶马交易。“羊楼峒（即今羊楼洞），距县六十里，产茶”。明初，临湘的“龙窑茶”曾是贡茶。

羊楼洞位于蒲圻区西南 26 千米处，地处湘鄂交界之要冲，境内“芙蓉山”，亦称松峰山，为“松峰茶”原产地。康熙年间，羊楼洞就以其芙蓉山出产的优质茶而名闻一时。据羊楼洞《雷氏族谱》记载：“羊楼洞本茶市也。自（清）国初以来，晋人岁挟钜金来此采办，相高大之宅，托为居停主人焉，及秋则计其收茶之值以纳租金，近二百余年矣。”清人叶瑞廷《菴蒲随笔》也记：“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于邑西乡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与羊楼洞紧邻的湖南临湘聂家市和羊楼司所产的老青茶也早已驰名，当时主要由陕商经营。乾隆年间，晋商在羊楼洞和羊楼司开设茶庄，最早的是“大盛魁”开设的“三玉川”、“巨盛川”两个小号，每年生产帽盒茶 40 万公斤。羊楼洞用观音泉等三条小溪的水压制砖茶，“川”字号洞产青茶畅销于蒙俄市场。嘉庆年间（1796—1820），晋商以“陕引”就地压制“花卷茶”外销，当地茶叶加工已小有规模。时有赵顺偶的